

# 口述金山 对口支援

## 高天厚土结深情 碧海青天夜夜心

### 编者按:

自1979年中央提出并实施对口支援以来,金山区(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勇担历史责任,相继对西藏日喀则市(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云南普洱市(思茅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援建干部把受援地区作为“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群众手拉手、肩并肩,为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边疆稳定和社会稳定,谱写了历史新篇章,留下了一个个体现金山与受援之地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了宣传援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弘扬援建干部的精气神,更好地推进扶贫协作工作,现将援建干部的口述文章择优予以选登,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稿件由中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我于2007年6月至2010年5月,作为上海市第五批援藏干部对口支援日喀则市亚东县。刚参加援藏时,我三十出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而当时的一切,仍历历在目。



### 1

### 平凡的日子与不平凡的决定

2007年,当时我在金山山区政工程管理署任办公室主任。每天工作虽紧张忙碌,却也平淡幸福。有一天,记得是3月6日,我正在看《解放日报》,不经意间突然瞥到一则市委组织部关于选派第五批援藏干部的通知,马上心头一紧。其实,不知道是命中注定还是家中“老西藏”(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一直有援藏的梦想。所以,从第二批援藏选派开始,我就坚持报名,但几次下来都没能如愿。当看到第五批选派的消息,当时就“条件反射”式地马上又报了名。

但自己静下来以后,一些犹豫却涌上心头。父母年事渐高,家中孩子尚小,去还是不去?去,难舍自己的小家;不去,难灭心中的梦想。当天晚饭时分,我向父母、妻子说出了自己的犹豫。本以为家人会劝我慎重,再考虑考虑,没想到父亲说,“去吧,有机会去一定去。家里的事情你放心,有我们在,怕什么!我在西藏待过,去跟不去,(人)不一样。”一瞬间,我怔在了原地。我朴实的家人们,平时沉默寡言,但关键时刻话语间却有山海一样的情怀,给我支撑,给我动力。

递交完申请后,我一边正常上班,一边焦急地等待消息。3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时任区建交委党组书记赵从云同志的电话,她说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士康同志明天找我谈话。又过了两周,我作为同一岗位的第二候选人到市委组织部谈话。谈话从下午1点开始,但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偌大的候谈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仍没轮到我。这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呀!怎么还有一个人?”才安排我参加谈话。自己是第二候选人,又在角落差点被人遗忘,这场景,现在想想,能去西藏也确实是一种机缘。

4月初,我接到通知,经综合考虑,组织部门最终选择了我,并要求做好准备,参加市委组织部举办的培训班。就这样,我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 2

### 海上的风与高原的光

6月7日,市委、市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为第五批援藏干部举行欢送会。会后,时任陪送团团长的肖贵玉同志全程陪同送行。其实,出发如此迅速的原因,与市、区两级组织部门的周密安排、细致部署是分不开的。早在出发前,区委组织部已提前通知我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将要带的必需品收拾好,然后一大包一大包先发往西藏。因此当我到达亚东县政府招待所的时候,包裹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从拉萨到日喀则,再到亚东县,凡落脚之处,“切玛”“哈达”处处载歌载舞,无不体现着当地干部群众对上海援藏干部发自内心的热情与欢迎。但初到西藏,有几个难题是首当其冲要面对的。第一个是高原反应。6月8日下午,我们先日到日喀则,当时我与时任亚东县委常委沈纪国同志住同一宿舍。可能因为长途跋涉,当晚,我们两个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沈纪国同志比我还要严重,躺在床上下不来,我把组织部发的止痛片、“吸氧卡”给了他,自己硬扛着撑过了前几个晚上。

6月12日,终于到达亚东。亚东县海拔大概3000米多一点,是西藏的“小江南”。按说,光高反也还算过得去,但如果再增加些力气活,就有些吃不消了。那时候我住在县政府安排的周转房里,条件比较简陋,屋子里经常断水,时不时还停电。每天用水都是到周转房楼下广场上的蓄水池里打了,再提到三楼。每次提完水,都是上气不接下气,饭也吃不下。所以我每天体力的极限只能打两桶水,烧水、洗衣服、冲厕所都要“精打细算”,也是“惨”到了一定程度。第二个是饮食习惯。援藏期间我们一直在政府食堂(当地叫中灶)吃饭。藏族师傅烧的基本上都是四川菜,炒青菜特别喜欢放大把辣椒、花椒,重麻辣的滋味跟上海相对清淡的口味差太多,一口下去感觉嘴里要“喷火”。上海这里不怎么吃鲤鱼,但是中灶每个月好不容易有一两次做生鲜类菜肴,却基本上都是红烧鲤鱼。一开始我夹了一块鱼肉,刺还没挑完,桌子转了一圈就剩个骨架了。那时候三十刚出头,也算“大小伙子”,动作一慢、一精细,稍不留神就会吃不饱。第三个是语言问题。我不懂藏语,许多藏族老百姓也不懂汉语。怎么工作?当时我摸索出了两个“武器”。一个是学一些简单的藏语,到藏族家里先用藏语问候,说一些藏族“吉祥语”,与群众的关系自然也就融洽了几分。另一个“武器”就是格桑,格桑是我的驾驶员兼藏语翻译。与藏族群众交流的时候,一般我先问,格桑翻译过去,群众说了之后,格桑再译过来,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对应词汇,大家还要“你来比划我来猜”。好在时间长了,我跟格桑的默契度越来越高,交流也越来越顺畅了。

按照组织安排,我任亚东县建设局局长。后来根据机构改革情况,我转任亚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三年光阴,我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将一分一毫的力量写在卓木拉日雪山山下。为了尽快摸清亚东建设情况,2007年下半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与亚东联络小组其他4名成员的休息时间和双休日不是在调研,就是在调研的路上。几个月间,我们走遍了全县7个乡镇、25个村(居),走访了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地部队共计50多个单位,行程达3000多公里。那时候下乡途中经常手机一天没有信号,开始时家里人联系不上,还以为我出交通事故了。西藏天黑要晚上九点钟了,我们晚上回来,家里实际上已经半夜了,才战战兢兢打通电话,后来家里人才逐渐习惯了我经常“失联”的状态。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大量亚东建设规划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特色产业规模化,城镇建设高水平,基础设施稳推进,生态环境文明美,社会事业大发展,局势稳定促和谐,党的建设夯基础”的对口支援工作思路;确定了三年内新建项目25个,总投资3020万元的工作方向。对原来亚东县城规划提出了16条意见和建议;对县辖两个乡镇进行了前期规划,并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帕里小城镇规划》和《亚东口岸中长期发展规划》,结束了亚东乡镇建设无规划可依的历史。亚东工作苦,下面乡镇上加苦。吉汝乡有“三最”的称号,即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恶劣,生活条件最艰苦。乡域面积1024.22平方千米,但是2008年时总人口却只有800多人,牧民随季节转场,是一个典型的牛羊比人多纯牧业乡。牧民人畜饮水十分困难,生产生活没有保障。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决心为吉汝乡群众解决水源问题。经过审批、立项、招投标后,我和联络小组的同志带着施工队立即开始下乡,寻找合适的水源点。那时为了节省时间,天不亮就出发,打包带好干粮,饿了就找个背风遮阳的山坡席地而食。天冷的时候,饭菜又凉又硬,吃完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浑身发抖;有时候运气比较好,中午时分当地乡干部赶过来送一点热菜(牛肉),但是高原地区牛肉不用高压锅根本煮不烂,很难嚼碎,但当着藏族同胞的面,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只能“扯”着嗓子往下咽,那情形真是终生难忘。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的11月,经过几个月的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我们终于找到了干净清洁、合适的水源点,并建好了第一个蓄水池。汩汩的高原清

### 3

### 走过的路与藏民阿妈的眼泪

泉流进水槽里,也流进了牧民们的心田里。吉汝乡的吉汝拉康第五世白玛桑巴活佛托当地群众向我们表达谢意,并叮嘱援藏结束之前,一定到吉汝拉康拜访,当面向我们表达感谢。当地的一位牧民阿妈眼里噙着泪水,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竖着大拇指不停地说:“亚古都!亚古都!”(藏语很好很好的意思)。看到牧民的欢笑和感激之泪,看到他们生活的改善,我们觉得之前的所有努力与辛苦都是值得的。除了做好工作,帮扶济困也是援藏干部的使命之一。在高原地区,多一份爱,便多一份光,西藏的孩子们便多一份希望。2008年底回沪之际,亚东县教育局送来了一份帮扶资助亚东学生的名单。根据联络小组的安排,每个区负责20个藏族学生的帮扶工作。回上海后,我找到时任石化城建公司董事长于小粮同志,通过他的协调,以组织认领和个人认领的方式共募集资助助学善款4万多元,虽然不多,但那是金山人民的心意,无论如何我也要带到亚东,亲手交到孩子们的手里。回西藏时,我把现金随身带在身边。当时,飞机进入藏区以后抖动颠簸得厉害,机舱内一片恐慌,我旁边的女乘客吓得哭出了声来。到了拉萨上空都能看到机场了,无法降落又颠簸颠簸返回了成都。当晚,航

### 深入学习“四史” 坚守初心使命

【口述前记】  
朱瑞军,1975年8月生,现任金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2007年至2010年,担任西藏日喀则亚东县建设局局长。



### 4

### 今天的人们与当年的花儿

援藏经历是一生的财富,有些收获在经历岁月沉淀、磨砺之后历久弥新,更显宝贵。第一个是对天地生民的敬畏。藏区高天厚土、山川万壑、雪山圣湖。白天在路上驾车驰骋半天可能都看不见一个人,夜晚繁星如海、银河如练,斗转星移,苍穹万古如初。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感觉个人很渺小,生命很短暂,不由自主产生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会激起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也会让内心止争息纷、平静澄澈。第二个是诚挚情感的培育。三年时间不长,却结交了一批诚挚的老友。憨厚老实的普布石达,尽职尽责的格桑,敢闯敢拼的达春,温文尔雅的王飞,博学多才的徐志文等等。三年间每年中秋佳节,我都托时任金山区市政管理工程管理局局长王治权同志从上海寄来一箱一箱的“杏花楼”月饼,送给建设局机关同志、亚东好友以及局属环卫工人(基本都是特困户),再自费请大家在中秋月夜“聚个餐”。吃饭的时候,有些环卫工人总说,“朱局长,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的月饼,这么好吃的菜!”大家都开怀大笑。第三个是对组织关怀的感恩。到西藏的第一年,家属身体不好。时任上海市第五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赵卫星同志和时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陈雪强同志都亲自打电话慰问,并委托区委组织部帮助到市区医院看病。闵卫星同志和陈士康同志还亲自到家中慰问,带去组织的关怀。三年间,正是组织部门不间断的悉心帮助,才让我们这些援藏干部能够安下心来、扑下身子,在雪域高原代表上海干部、上海人民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2010年春天,我援藏即将满三年。亚东县建设局全体同志,特别是下属环卫工人联名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写信,请求让我再延期三年。上海、西藏两地组织部门征求本人意见并在充分考虑我身体情况以及家庭实际后,最终还是让我在完成三年援藏任务后返沪。援藏结束之后,回过三次西藏,到过一次亚东。前两次是跟随金山区党政代表团到日喀则,慰问第六批援藏干部,因为时间原因没能回亚东。2019年,趁“十一”假期,援藏结束10周年之际,我和家人又回了一趟亚东。我们当年战斗过、建设过的亚东县城条件越来越好,交通愈发方便,民众脸上泛着红光、互致问候,街市太平、熙来攘往、充满烟火气的感觉真好。亚东的藏族老朋友有的十年未见,却一点没老,感觉比以前更年轻;我和妻子还专程到老书记次仁曲珍家拜访,老书记的藏式小院子修葺得十分精致,星星点点开满了许多小花,有几株晚开的格桑花,正随风摇曳,在高原的阳光下闪耀着琉璃般的光,这些花儿与我那年刚到西藏时,一模一样……

